

董知珍 ◇ 著

7—18世纪西域与西藏地区 佛教交流史

7—18世纪西域与西藏地区 佛教交流史

董知珍 ◇ 著

宗教文化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7-18 世纪西域与西藏地区佛教交流史/董知珍著. - 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 2014.6

ISBN 978-7-80254-869-5

I. ①7… II. ①董… III. ①佛教-文化交流-历史-西域、西藏-7~18 世纪
IV. ①B9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129821 号

7-18 世纪西域与西藏地区佛教交流史

董知珍 著

出版发行: 宗教文化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后海北沿 44 号 (100009)

电 话: 64095215(发行部) 64095201(编辑部)

责任编辑: 王鸣明

版式设计: 高秋兰

印 刷: 北京信彩瑞禾印刷厂

版权专有 不得翻印

版本记录: 880×1230 毫米 32 开本 12.5 印张 300 千字

2014 年 6 月第 1 版 201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254-869-5

定 价: 58.00 元

序

洲 塔

古代之我国新疆地区为古代之西域,历史上是东西方多民族的栖息地,也是佛教、祆教、摩尼教、景教、伊斯兰教等宗教传播的沃土。在这些宗教传播、发展的历史中,佛教为传播最早、发展时间最长的宗教,直至今日新疆的佛教仍然是伊斯兰教之后的第二大宗教。

西域在古藏文文献中称之为“李域”,是印度佛教于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前1世纪之间从迦湿弥罗(今克什米尔)传到此地,又从这里翻山越岭传到我国西藏,成为当时除印度之外又一个佛教的早期传播中心。佛教传入西域后,佛教历经几个世纪的艰难曲折的发展后,最终为西域各民族所接受的一种宗教信仰,西域佛教由此形成。西域佛教从形成到西域伊斯兰化完成的一千多年时间里,对中原、漠北和西藏等地区的佛教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从20世纪初西方和日本的学者带去了新疆境内大量佛教文物和艺术品后,对西域地区佛教的研究成为西方和

日本学术研究的重要对象,因而成为显学。受到西方和日本学者注重研究学风的影响,我国的向达、林梅村、黄文弼等学者最先开始了本土化的研究,并结出了累累硕果。新中国成立后,以任继愈、张广达、汤用彤、荣新江、余太山、魏长洪、李泰玉、李进新、霍旭初、贾应逸、才吾加甫等一代代学者在各自的研究领域取得了一大批令国内外学术界瞩目的成果,使西域佛教史的研究更加深入、范围更为广阔。然西域佛教是一个矿藏无比丰富的聚宝盆,随着考古发现的新材料不断出现,新的研究手段和方法的采用,将产生一大批学者结合自身的学术背景和视阈,选取一个全新的角度,就会产生新的研究成果。我认为董知珍博士的这本专著就是众多新的研究成果之一。

该书以7-18世纪西域与西藏地区的佛教交流为主线,在充分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参考了一些古藏文文献,全面论述长达1000多年的历史时空里这两个地区佛教相互交流的全貌,使人对这两个地区的佛教各自发展和相互交融的历史有让人耳目一新的认识。全书有如下特点:

一、线条清晰、层次分明。本书有一条主线,两条副线,主线贯穿始终,副线相互交织。本书的主线是7-18世纪西域与西藏地区佛教的交流,副线是西域和西藏在这段时间里各自的历史,涉及政治、军事、宗教、文化等方面。主线放在西域和西藏两个地区每个阶段历史发展的大背景下,副线既是分别论述这两个地区历史演进的平行线,也是这两个地区佛教相互交流交融的交织线,让人在了解

西域与西藏地区佛教交流史时,对西域和西藏的每个时期的历史有所认识,同时更能深入理解西域与西域佛教交流的状况。

二、视角新颖、视野广阔。对于西域佛教史的研究,不管是日本学者羽溪了谛还是魏长洪、李泰玉、李进新、才吾加甫等中国学者,都是以史料为基础对佛教在西域的产生、发展进行论述,而该书是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选取了一个具有开创性的角度,对西域和西藏地区佛教的相互交流这一学界尚未关注的问题进行探讨,更加清晰地梳理了藏传佛教在西域传播的情况,其涉及的范围不仅仅是西域和西藏这两个佛教圣地,而且延伸到中亚、蒙古等广大地区,不仅在前人分散研究的基础上勾勒出藏传佛教在西域活动的整个轮廓,而且以宗教传播为主线,论述了在长达一千多年时空变幻中的民族交流和互动,视野开阔。

三、论证有力,资料翔实。本书以大量的汉藏文文献,对佛教在西域的传入时间、佛教传入吐蕃的时间、藏传佛教在西域的初传、佛教在回鹘和蒙古等民族的传播等学术问题进行认真的探讨和分析,在分析前人观点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学术观点,体现了比较扎实的学术功底。该书所参考的资料非常翔实,不仅有各个时期的汉文史料,而且有更多的藏文史料,对每一个专题的论述,力图最大程度的吸收前人的学术成果,并对这些问题进行了讨论。全书的论证既有基础性的史料,也有大量的考古成果,甚至还有本人的实地考察,具有比较强的说服力和可信度。

董知珍博士为人诚实,学习认真,善于钻研,家庭经济

条件很不富裕,但他把这些困难看成是一种持之以恒的动力。我作为他的导师,见证了他的成长。三年的博士生涯,他既要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也要进行学术研究,还要承担家庭的重任,其中付出多少艰辛和汗水,是常人不可想象的。尽管书中还有很多专家眼里看来的不足之处,但他能够以很大的勇气承担起这个具有很高难度的课题,实属不易!书中对一些问题的开创性的探讨能够把这一主题的研究引向深入,这是本书的最大贡献。我深深地感受到他的努力和精进,正如他自己所说的一句话“从硕士论文《洪武永乐时期明朝与西域诸国关系》到博士论文《西藏与西域在佛教方面的交流》,我对西域史产生了很深的感情,新疆的山山水水和各族人民是我心之所系,因而对西域史的研究成为我精神之所寄”可知他的一片真挚之情!我很高兴地看到他的成果即将面世,也希望他能够在这条艰辛的学术之路取得更多更好的学术成果。

是为序。

于兰州大学一分部

2014 年 4 月 24 日

导 言

西域(我国新疆地区)是我国汉族、月氏、乌孙、匈奴、塞、羌氏(藏族先民)、鲜卑、柔然、高车、突厥、回纥、吐蕃、黠嘎斯、契丹、蒙古、哈萨克、塔吉克、满、回、锡伯等众多民族的重要活动舞台,同时也是乌孜别克、塔塔尔、俄罗斯等民族的迁入地。在长期历史发展进程中,各民族通过经济、文化的交流和互通婚姻,促成了西域各民族的形成。在这些民族形成的过程中,有大量的汉族成员被吸纳其中,最终形成了各民族大分散、小聚居的格局。在西北边疆地区有些少数民族在古代由于频繁的迁徙,特别是近代由于沙俄的侵略,通过不平等条约割占我国大片领土,从而形成了一些民族跨境或跨国居住的局面,使这一地区的民族关系更趋复杂。我国历代中央政府特别是两汉、唐和清代对西域进行了有效的统治和开发。在分裂时期,西域的各个地方政权在开发与建设西域的同时,主动地与中原地区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保持密切的联系和交流。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边疆各族人民与汉族人民一道开发边疆、建设边疆。特别重要的是,他们与一部分民族分裂势力和外来侵略势力分裂祖国的行径进行了英勇的斗争,共同维护了我国多民族国家的统一。

正由于西域在历史上的多民族性,注定了这里是多种宗教传播的沃土。自秦汉以降,西域以其独特的地理及人文环境,不断吸

引各种语言、各色肤色的部落、部族及民族在此或游牧狩猎,或从事农耕,他们把各自的宗教信仰带到这里,从而形成了绚丽多彩的宗教文化,成为西域文化最具鲜明特色的文化宝藏。

早在秦汉时期,或在此之前,西域的游牧民族以原始的萨满教为其宗教信仰。这种原始宗教与其说是一种宗教信仰,还不如说是这些游牧民族对自然力或超自然力的敬畏。就在这一时期,源自古印度的佛教在阿育王的发扬光大后,迅速向四周传播开来。西域成为佛教最先传入我国的地区,它或由古印度直接传入,或经由中亚传入。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中原地区的大分裂、大动荡时期,佛教在动荡的中原和相对稳定的江南遍地传播的同时,在西域迎来了它发展的繁盛时期。于阗、龟兹和后来的高昌是佛教传播的中心。而此时的于阗已俨然成为中原佛教徒们向往的佛教圣地。在佛教繁盛的同时,佛教并没有因为其独大而排斥其他宗教,这一时期,源自古波斯的祆教也在西域诸民族中取得了它的一席之地。直到今天在西北少数民族的习俗中还残存有祆教的遗迹。

安史之乱后,唐王朝逐渐丧失了对西域的控制,吐蕃和回鹘成为这一地区的有力角逐者。9世纪中叶,吐蕃和回鹘政权相继瓦解,造成了回鹘的南下西进和吐蕃势力的退撤。回鹘在西域建立了喀喇汗王朝和西州回鹘王朝,前者被逐渐伊斯兰化,而后者依然信奉佛教,随着与吐蕃交往的加深,遂改宗了藏传佛教。这在客观上延缓了西域伊斯兰化进程,直到15世纪中后期,这一进程最终完成。

在西域开始伊斯兰化的进程中,藏传佛教也与此同时传入了西域,在西域的吐蕃遗民成为最早的信奉者,而与吐蕃人有密切关系的回鹘人也逐渐在语言、风俗习惯等方面受到吐蕃的影响,最终在宗教信仰上接受了藏传佛教,而从11世纪起,藏传佛教逐渐取代了西域佛教成为佛教的主流。12世纪早期,从东北西迁至西域

的西辽政权的一些王公贵族也接受了藏传佛教,藏传佛教在西域有了新的发展。特别是13世纪蒙古人接受藏传佛教以后,藏传佛教在诸汗国内被统治者信奉,他们中有的推崇噶举派,有的改信萨迦派,都力图利用藏传佛教在扩大其影响,以此来角逐西域的主导权。因而,在蒙元时期,藏传佛教在西域各地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成吉思汗及其子孙通过三次西征建立起来的四大汗国,其内部也充满各种矛盾和斗争,特别是窝阔台汗国和察合台汗国,他们一方面与蒙古汗国(元朝)存在矛盾,另一方面他们之间为了争夺西域的主导权发生冲突。从13世纪后期开始的西北宗王之乱,各方打打停停,一直持续了四十余年。最终的结果是元朝为了平息叛乱消耗了自身的力量,窝阔台汗国则为察合台汗国所并,然而后来的察合台汗国在14世纪中期也一分为二。在西域动荡和纷争中,伊斯兰教却得到了发展,以致后来在西域的蒙古贵族接受了伊斯兰教而逐渐被伊斯兰化。直至15世纪、16世纪初伊斯兰化的完成。但西域的伊斯兰化不是整个西域的伊斯兰化,而是主要在沿塔里木盆地周缘的绿洲城镇直至吐鲁番哈密一带的伊斯兰化,在天山北麓到阿尔泰山之间的广大牧场仍然是蒙古人的天下,特别是从15世纪早期起,信奉藏传佛教的瓦剌陆续进入天山以北的广大地区后,与信仰伊斯兰教的察合台后王之间发生了频繁的冲突,瓦剌在西域的发展,阻碍了天山北麓广大地区的伊斯兰化,为藏传佛教格鲁派的传播提供了空间和机会。

16世纪中后期,土默特蒙古部首领俺达汗迅速崛起后,效仿当年的忽必烈,迎请正处于困境中的格鲁派首领三世达赖索南嘉措,而索南嘉措也急于得到外部势力的支持以对抗噶举派的迫害,便欣然前往蒙古传教,于是促成了藏传佛教格鲁派在蒙古的传播,在此之后,瓦剌部也接受了格鲁派。到17世纪中期,蒙古各部均信

奉了格鲁派。17 世纪中后期,漠西蒙古的准噶尔部迅速崛起,其势力在西域迅猛壮大,并建立了强大的准噶尔汗国,藏传佛教随即在西域得到了快速传播,尽管汗国于 18 世纪中期被清朝所灭,但有相当数量的蒙古人仍留居西域,由此形成了今天藏传佛教在新疆发展的格局。

一、选题意义

西域和西藏本山水相连,那里自然环境严酷、交通艰险、气候异常恶劣、天气多变,这本应是两地人民来往的制约因素,但许多考古发现证实西藏和西域自远古以来就有十分密切的往来,而且从西域古文字记载中可以得到印证。从秦汉时期佛教传入西域起,西域佛教便在这里生根,并且成为中国佛教的重要一支,从松赞干布时起,吐蕃引入了佛教,^①尽管当时的苯教占有绝对的优势,但佛教经过一段时间的沉寂后在赤松德赞时期终于得到了弘扬,

① 关于佛教传入西藏的传统观点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以木雅贡布、谈延柞、王尧等为代表的学者认为,不排斥佛教在公元 5 世纪拉脱脱日年赞时期有渗入吐蕃的可能,因为这个时期吐蕃的周围都是信奉佛教的国家和地区,尽管当时藏族还没有创立和使用文字,但是佛教在这前后渗透到今天的西藏地区,是完全可能的。以张达愚、法尊法师、王森等学者通过对藏、汉文史料认真分析,认为松赞干布时期,文成公主与赤尊公主带入佛像佛经,佛法正式传入,但由于当时苯教思想占统治地位,并未发生多大作用。仲布·次仁多杰根据《弟吴宗教源流》、《娘氏宗教源流》、《青史》、《西藏王统记》、《贤者喜宴》、《拔协》等藏文史料和《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等汉文史料的深入分析后认为佛教传入西藏的历史时间是公元前 3 世纪,而拉脱脱日年赞时期佛教传入西藏的说法,无非是王室家族为了辩护其权威而产生的。才让太通过对佛教史籍的分析后认为现有的定论存在学术局限性,他认为印度的佛教确实试图北传吐蕃,可能因为当时条件尚不成熟而半途而废,甚至一直到松赞干布时期的五代赞普期间,再没有任何佛教传入的类似记载。他通过对苯教文献的研究后认为佛教试图传入吐蕃的时间远在吐蕃第七代赞普桑赤赞普时期,并且在他之后的止贡赞普时期仍然没有停止在吐蕃的活动。笔者认为,佛教在公元前 3 世纪到公元 7 世纪松赞干布执政前,佛教传入西藏是有可能的,而公元前 3 世纪聂赤赞普、公元 1 世纪止贡赞普和公元 5 世纪拉托托日年赞年赞时,是佛教传入西藏的三个重要的节点,因而笔者认为松赞干布时引入了佛教,亦即是佛教于 7 世纪时在西藏开始传播。

最终形成了吐蕃佛教。从这时起,佛教成为西藏与西域交往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内容,即使在这段沉寂的时期里,以于阗为中心的西域佛教与吐蕃进行某种方式的交流,并且得到了金城公主等人的保护和支持。赤松德赞及以后,佛教在吐蕃得到历代赞普赞普的大力弘扬,来自印度、克什米尔、于阗和汉地的僧人在吐蕃弘扬佛法,特别是于阗的僧人参与了吐蕃第一座佛教寺院——桑耶寺的修建,吐蕃受到了来自多方佛教的影响。吐蕃在控制西域以后,佛教依然兴盛的于阗成为吐蕃控制西域的重镇,而龟兹等地石窟的绘画和雕塑艺术中含有吐蕃元素,说明了其对西域佛教的影响。吐蕃与西域的经济、文化联系更加密切,可以肯定,驻扎在于阗一带的吐蕃军士和被迁移到这里的吐蕃诸部落不同程度地受到西域佛教的影响。

吐蕃王朝崩溃后,驻守在西域的吐蕃军士和部落留居了下来,迟至五代时仍然有大量的吐蕃遗民生活在丝路南道一带,10世纪后期,移居于中亚的喀喇汗王朝改信伊斯兰教,并向于阗发动进攻,大批的佛教徒在这场战争中惨遭杀戮,被喀喇汗王朝控制的于阗居民不得不接受伊斯兰教,仍然有许多佛教徒沿着丝路南道向东逃亡。以于阗为中心的西域佛教遭到重创,从此,西域佛教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到12世纪时,西域佛教再不见于史籍记载。

正当伊斯兰教向西域扩张时,正在形成的藏传佛教也开始在西域传播,并逐渐被西迁到西域的回鹘人所接受,12世纪时,西迁到西域的西辽的部分贵族和13世纪西征的蒙古人相继接受了藏传佛教,15世纪瓦剌进入西域以后,藏传佛教在西域的影响有所加强,特别是17世纪中叶准噶尔汗国建立后,西藏和西域在佛教方面的交流进入了高潮,这极大地促使了藏传佛教在西域的传播和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十多年来,随着新疆考古的深入和旅

游业的持续开发,一些隐身于人迹罕至的和湮没于沙漠之中的遗址陆续被发现,特别是丹丹乌里克和达玛沟佛寺遗址的发现和遗址的清理,还有古藏文简牍和文献、实物和遗迹的发现,大大地丰富了吐蕃统治时期西域历史的研究资料,加深了我们对西藏与西域在佛教方面交流的认识。然而,大量的古藏文文献仍然没有得到系统的整理和有效的利用。因而对这些资料的整理和利用,有助于深入研究这一时期的西域历史,特别是对吐蕃统治西域时期的西域佛教与吐蕃佛教的关系问题的研究。长期以来,学界把吐蕃佛教的形成与汉传佛教和印度佛教联系起来,而对吐蕃与西域的紧密联系,特别是西域佛教对吐蕃佛教的影响没有足够的认识,因而对西域佛教与吐蕃佛教的关系问题的研究,有助于对藏传佛教形成等问题的研究。藏传佛教作为我国佛教的重要一支,在我国历史发展长河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它对于我国历史上的一些重大历史事件的进程和民族关系产生了十分重大而又深远的影响,就现实而言,藏传佛教在我国新疆地区的蒙古族、锡伯族中仍被信奉,藏传佛教在缓和民族矛盾、调解民族关系方面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从历史角度看,藏传佛教尽管被统治阶级所利用,在一定程度上是导致民族矛盾和冲突的因素之一,但它仍然具有缓和民族矛盾、调解民族关系的功能。从学术角度看,目前学界还没有一部有关西藏和西域在佛教方面交流互动的专著出现,故而这一选题对于深化和拓展藏传佛教的形成以及在西域的发展传播和调适民族关系等方面具有很重要的学术意义。

二、研究现状

关于藏传佛教的研究,历来是学界关注的一个重要内容,其中

有专人对一百年来藏传佛教的研究做了系统的综述^①,不过总体而言,学界对西藏与西域在佛教方面的交流缺乏深入系统的研究。本书主要论述了7-18世纪一千多年西域与西藏在佛教方面的交流和互动以及西域佛教、吐蕃佛教和藏传佛教之间的关系、藏传佛教在西域的传播发展、西域的佛教寺院以及和西藏之间的联系等方面的问题。

对西域佛教的整体性论述的专著有:魏长洪等所著《西域佛教史》^②,该书主要探讨了从印度佛教的产生、印度佛教在西域的传播、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的发展,直至藏传佛教在西域的兴起为主线,全景式地展现了西域佛教的发展兴衰。日本学者羽溪了谛的《西域之佛教》^③一书论述了从佛教东传以后至隋唐时期大月氏、安息康居、于阗、龟兹、疏勒高昌、迦湿弥罗等地佛教发展的情况。李进新的《新疆宗教演变史》^④一书对新疆自远古以来各种宗教(包括佛教)的发展演变做了粗线条式的论述。李泰玉的《新疆宗教》^⑤一书,对有史以来新疆的佛教、祆教、摩尼教、景教、道教和伊斯兰教等宗教进行了粗线条的勾勒和梳理,其中对新疆的佛教论述不乏真知灼见。蒙古族学者才吾加甫的《新疆古代佛教史》^⑥一书对西域古代佛教在结合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做了一番梳理。余

① 这些综述主要有:王启龙、邓小咏:《1949年以前藏传佛教研究的回顾》,《法音》2001年第8期;王启龙:《1950-2000年中国藏传佛教研究》,《法音》,2003年第8期;尕藏加:《新中国的藏传佛教研究——回顾与展望》,《世界宗教研究》,2000年第2期。

② 魏长洪等著:《西域佛教史》,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8年。

③ [日]羽溪了谛:《西域之佛教》,商务印书馆,1999年。

④ 李进新:《新疆宗教演变史》,新疆人民出版社,2003年。

⑤ 李泰玉主编:《新疆宗教》,新疆人民出版社,1989年。

⑥ 才吾加甫:《新疆古代佛教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

太山主编的《西域通史》^①和其姊妹著作《西域文化史》^②就各个时期西域佛教的发展做了论述,其中有些章节的内容具有一定的探索性和借鉴意义。

于阗作为西域的佛教中心之一和与西藏联系最密切的地区,其佛教的发展以及对吐蕃佛教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于阗地区的佛教受到中外学界的关注。李吟屏的《佛国于阗》^③一书论述了从先秦到宋朝,佛教在于阗地区发展的兴衰变迁,作者最后探讨了伊斯兰化后的于阗社会。张广达、荣新江的《于阗史丛考》^④通过在于阗、敦煌等地出土的文献和文物和法国巴黎国立图书馆所藏的于阗语写卷,对于阗等地的历史做了详尽的考证。

从7世纪中后期起,吐蕃势力开始向西域渗透,并在与唐朝展开了争夺西域的拉锯战,虽然在692年以后,唐朝将吐蕃军队赶出了安西四镇,但吐蕃对安西四镇的觊觎始终没有放弃,安史之乱后,吐蕃终于利用唐朝势力大大衰弱之机,最终控制了西域,对这一时期历史做详尽研究的有张云和杨铭,前者著有《唐代吐蕃史和西北民族史研究》一书,对唐代吐蕃历史、吐蕃时期的佛教和吐蕃与周边诸族的关系做了详细的论述。后者著有《唐代吐蕃与西域诸族关系》^⑤一书,对吐蕃王朝与其周边诸民族的关系做了深入细致的考证,同时也论述了吐蕃与天竺、大食等强邻之间的关系,作者还论述了吐蕃统治西域时期的各种制度。此外王小甫的《唐、吐蕃、大食政治关系史》^⑥一书详细论述了唐、吐蕃、大食之间既合作又斗争的复杂关系,可谓这一时期历史的一部力作。

① 余太山主编:《西域通史》,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年。

② 余太山主编:《西域文化史》,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6年。

③ 李吟屏:《佛国于阗》,新疆人民出版社,1991年。

④ 张广达、荣新江:《于阗史丛考》,上海书店,1993年。

⑤ 杨铭:《唐代吐蕃与西域诸族关系》,2005年12月。

⑥ 王小甫:《唐、吐蕃、大食政治关系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

对西域佛教壁画进行深入研究的学者有贾应逸和霍旭初,贾应逸、祁小山的《印度到中国新疆的佛教艺术》^①和贾应逸的《新疆佛教壁画的历史学研究》^②对西域各地的佛教石窟和壁画进行深入研究,特别对克孜尔、库木吐拉等地的石窟和壁画中的吐蕃元素进行了探讨,可见西域和西藏佛教的频繁交流。霍旭初的《西域佛教考论》^③一书对西域佛教的诸多问题进行了探讨,其中涉及到龟兹密教、龟兹石窟壁画、克孜尔石窟一书等问题。此外吴涛的《龟兹佛教与区域文化变迁研究》^④一书对龟兹地区佛教的发展变迁进行了探讨。

17世纪初,藏传佛教在西蒙古各部中得到传播,对这一时期卫拉特各部的研究主要有:马大正、成崇德的《卫拉特蒙古史纲》^⑤分别论述了卫拉特和硕特、准噶尔、土尔扈特、杜尔伯特和辉特等部发展的历史,全景式展现了卫拉特各部发展的全过程。白翠琴的《瓦剌史》^⑥追溯了瓦剌部的族源,早期发展的历史,重点探讨了明朝时期瓦剌与鞑靼、明朝和东察合台汗国、哈萨克、吉利吉斯等之间的关系,最后论述了瓦剌的西迁。杜荣坤、白翠琴的《西蒙古史研究》^⑦从蒙元时期到清代对卫拉特族源、重要历史人物、与中原、西域诸族关系、卫拉特法典、卫拉特官制演变、社会组织等西蒙古历史做了专题探讨,是西蒙古史研究的又一重要力作。《准噶尔史略》编写组的《准噶尔史略》^⑧主要论述了准噶尔部的族源、分布,

① 贾应逸、祁小山:《印度到中国新疆的佛教艺术》,甘肃教育出版社,2002年。

② 贾应逸:《新疆佛教壁画的历史学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

③ 霍旭初:《西域佛教考论》,宗教文化出版社,2009年。

④ 吴涛:《龟兹佛教与区域文化变迁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6年。

⑤ 马大正、成崇德:《卫拉特蒙古史纲》,新疆人民出版社,2006年。

⑥ 白翠琴:《瓦剌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

⑦ 杜荣坤、白翠琴:《西蒙古史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

⑧ 《准噶尔史略》编写组:《准噶尔史略》,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

发展历史,重点论述了准噶尔汗国的兴衰历史,是研究准噶尔部历史的一部集体智慧的力作。另外,俄国史学家伊·亚·兹拉特金的《准噶尔汗国史》^①利用了丰富的俄文档案等第一手史料,论述了准噶尔汗国的发展兴衰,特别是对俄准关系论述尤为详尽,尽管该书作者的一些观点值得商榷,但仍然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这些专著虽然对西蒙古各部特别是准噶尔部的历史的论述十分详尽,但对藏传佛教在西域的发展状况只是简单描述,没有详细深入地论述。

学界对吐蕃史和西藏历史的研究可谓硕果累累,本书只推举有代表性的著作。在吐蕃史方面最早的一部力作是法尊法师的《西藏民族政教史》^②是研究吐蕃史和藏传佛教史的一部必不可少的著作。黄奋生的《藏族史略》^③,对藏族从远古时期、吐蕃兴起、吐蕃王朝建立和崩溃、一直到西藏和平解放前的各个阶段的历史进行全面的论述。本书是一部运用马克思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写作的著作,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吐蕃史》探讨了吐蕃的族源、佛教传入吐蕃、重点论述了吐蕃王朝各个时期唐蕃之间的关系。才让太的《吐蕃史稿》^④全面论述了吐蕃王朝政治、经济、军事、对外关系、宗教、社会生活等方面的历史,是吐蕃是研究的一部最新力作。此外,涉及到吐蕃史的专著还有:《西藏通史——松石宝串》^⑤、陈庆英、高淑芬主编的《西藏通史》(上、下)^⑥、王辅仁、索文清的

① [前苏联]伊·亚·兹拉特金:《准噶尔汗国史》,商务印书馆,1980年。

② 法尊:《西藏民族政教史》,汉藏教理院,1941年。

③ 黄奋生编著:《藏族史略》,民族出版社,1985年。

④ 才让太:《吐蕃史稿》,甘肃人民出版社,2007年。

⑤ 《西藏通史——松石宝串》,西藏古籍出版社,1996年。

⑥ 陈庆英、高淑芬主编:《西藏通史》,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年。